

卷宗編號：55/2024

(民事上訴卷宗)

日期：2024 年 6 月 27 日

主題：

- 事實事宜的爭執
- 自由心證
- 經驗法則
- 惡意訴訟

裁判書製作人

唐曉峰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55/2024

(民事上訴卷宗)

日期：2024 年 6 月 27 日

上訴人：A (被執行人/異議人)

被上訴人：B (請求執行人/被異議人)

一、概述

B (以下簡稱“請求執行人”、“被上訴人”或“被異議人”) 向初級法院民事法庭對 A (下稱“被執行人”、“上訴人”或“異議人”) 提起執行之訴。

被執行人提出異議反對執行。

案件經過審理後，原審法官裁定異議理由不成立。

被執行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並在上訴的陳述中點出以下結論：

“1. 原審法院於被上訴判決中裁定：

“Pelo exposto, julgam-se parcialmente procedentes os embargos e, em consequência, reduz-se a obrigação exequenda apenas no que tange ao início da contagem de juros de mora, que, em vez se contarem desde a data da citação do executado para a execução, devem ser contados apenas depois de decorridos trinta dias desde a data da citação do executado na execução apenas.

Condena-se o embargante como litigante de ma-fé na multa de quinze (15) UCs.

Custas por embargante e embargado na proporção de 99% para o primeiro e 1% para o segundo.”

2.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不同意被上訴判決之判定，具體理由如下：

1. 原審法院有關認定事實存有錯誤

3. 被上訴人於本案例中不具正當性，執行名義屬無效或不具可請求性。

4. 於被上訴判決中，原審法院認定：

“g) Em 17 de Maio de 2005, a C celebrou com o exequente um “Contrato Provisório de Concessão de Crédito” através do qual, o exequente estava autorizado a conceder crédito para jogo ou para aposta na sua Sala VIP “D” , com um prazo de validade até à obtenção da licença e registo de promotor de jogo do exequente, devidamente autorizados pelas autoridade competentes. (Q. 6º)

h) Em Setembro de 2008, o exequente solicitou, pela primeira vez, a licença de promotor de jogo de pessoa singular à Direcção de Inspeção e Coordenação de Jogos de Macau e, no mesmo ano, obteve a primeira Licença de promotor de jogo n.º I104, que foi renovada até à presente data. (Q. 7º)”

5. 原審法庭僅依據上述內容來認定有關事實，但在本案例中必須關注的一點是被上訴人是否合法獲許可在 “D” 貴賓會內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之業務。

6. 事實上，根據第 5/2004 號法律第 8 條第 1 款之規定，「...合同必須採用書面方式訂立，一式三份，同為正本，有關簽名須經當場公證認定。」

7. 根據卷宗第 143-147 頁的《臨時信貸合同》認證繕本獲悉，相關文件根本無法證明被上訴人為本案例的債權人，因為載於卷宗第 143-147 頁之《臨時信貸合同》上有關 C 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代表 E 及 F 在文件上所作之簽署並非當場認定，並不符合法定要式。

8. 原審法庭認為上訴人並沒有提及被上訴人不符合發放賭博借貨的法律條件，只有稱不知道是否不符合，且上訴人沒有適當地援引關於發放賭博貸款合同的任何反對理由，因此沒有必要評估。

9. 然而，根據上訴人於 2021 年 6 月 2 日提交之書狀內容第 7 點至第 13 點已經主張了合同簽名不符合法律規定。

10. 值得注意的是，合同的繕立日期為“於澳門，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即，合同的簽署日期為 2005 年 5 月 17 日。然而，有關“C”代表人 E 及 F 的筆跡認定認證日期為 2005 年 5 月 21 日；而 B 的筆跡認定認證日期為 2005 年 5 月 17 日。

11. 根據澳門《公證法典》第 159 條第 3 款之規定“當場認定係指認定在公證員面前書寫及簽名之文書內之筆跡及簽名，或認定只在公證員面前簽名之文書內之簽名；在簽署人於認定時在場之情況下作出之認定，亦為當場認定。”

12. 根據第 5/2004 號法律《娛樂場博彩或投注信貸法律制度》中第 3 條第 2 款之規定，“二、娛樂場幸運博彩中介人(下稱“博彩中介人”)亦獲賦予資格，透過其一承批公司或獲轉批給人訂立的合同從事信貸業務。

13. 而該法律第 8 條第 1 款中對合同形式規範“有關簽名須經當場公證認定。”此外，根據第 5/2004 號法律第 4 條“按照本法的規定提供信貸，則產生法定債務。”

14. 即，娛樂場博彩中介人可以透過與承批公司/獲轉批人訂立之合同從事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業務，但該合同必須採用書面方式訂立，當中有關簽名須經當場公證認定。倘若沒有按照第 5/2004 號法律提供信貸，將不產生法定債務。

15. 事實上，上訴人從收悉被上訴人於案中附入《臨時信貸合同》認證繕本(即 2021 年 3 月 17 日提交，卷宗第 141 至 162 頁)後，已立即針對上述有關《臨時信貸合同》的法定要件提出了爭議，並根據第 5/2004 號法律第 8 條第 1 款之規定，援引出不符合法定要件之依據。

16. 上訴人於 2021 年 9 月 28 日提交之書狀內容中亦有再次重覆以上觀點，並提出質疑。

17. 因此，並不存在判決中所述之「上訴人並沒有提及被上訴人不符合發放賭博借貸的法律條件，只有稱不知道是否不符合，且上訴人沒有適當地援引關於發放賭博貸款合同的任何反對理由」之說。

18. 即是如此，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5 條第 3 款處分原則之規定，以及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6 條第 3 款調查原則之規定，在法官就其依法可審理之事實，應依職權採取或命令採取一切必需措施，以查明事實真相及合理解決爭議。

19. 按照上述原則，法庭理應考慮到本案中《臨時信貸合同》之合法性及正當性，皆因這是整個被上訴案件的關鍵之處，然而，法庭似乎並未就此事實作出考量。

20. 根據相同原告、不同被告、案情相同的第 CV2-19-0128-CEO-A 號執行異議案中已判定原告提交與本案相同的《臨時信貸合同》，已證實「“C”與被異議人/被上訴人於 2005 年 5 月 17 日簽訂的《臨時信貸合同》，C 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代表 E 及 F 在文件上所作之簽署並當場認定」(參見附件 1)。

21. 而有關事實認定是持案法官根據向當時作出筆跡認定的私人公證員 Dr G 作出了書面詢問，並透過其於 2022 年 9 月 29 日書面回覆中獲得證實，Dr G 私人公證員經再次檢閱文件後，給出上述肯定答案，該份《臨時信貸合同》並不是親身在公證員面前簽署的。(參見附件 2)

22. 再者，根據第 19/2020 號上述判決「隨著第 5/2004 號法律的通過生效後，根據該法律第 4 條的規定 – 其內容為“按照本法律的規定提供信貸，則產生法定債務” –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任何)在違反新的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作出的“娛樂場博彩信貸”，僅產生一項“自然債務”，應適用其專有的法律制度(澳門《民法典》第 396 條)，不能透過司法途徑請求履行。」(參見 2021 年 5 月 6 日第 19/2020 號中級法院裁決)

23. 換言之，只有按照第 5/2004 號法律的規定而提供信貸，方能產生法定債務。如果在該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外提供的信貸是不被接受的，該信貸根本不曾產生效力。這樣，由於自然債務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其具有“不可要求性”，即債務人不能被強制要求償付或履行該債務，因此，被上訴裁判不應予以維持。

24.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所附入的《臨時信貸合同》認證繕本基於所作之簽署並非當場認定；因此，不符合第 5/2004 號法律第 8 條第 1 款規定之法律形式要求；繼而，根據《民法典》第 212 條之相關規定，所簽訂之合同因不合法要件，合同屬於無效。

25. 在此情況下，博彩中介人在未具備合法的信貸業務合同下作出的放貸行為，並不受第 5/2004 號法律第 4 條所保障。即使債務存在亦僅屬自然債務，因而不得透過司法途徑追討。為此，有關情況足以使主案執行程序消滅。

26. 法官應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6 條第 3 款調查原則之規定，依職權查明本案中受爭議之事實，因為被上訴人在未具備合法的信貸業務合同下作出的放貸行為，並不受第 5/2004 號法律第 4 條所保障，故此，調查基礎內容第 6 點的事實不應視為證實。

27. 已證事實無法證明執行名義具正當性，在 2006 年 1 月 2 日、2006 年 1 月 3 日及 2006 年 1 月 9 日由 D 發出的借款單上，在借款人簽名欄內載有兩個簽名。

28. 根據庭審中所有書證，並結合上述由被上訴人(被異議人)提供的場面公關經理及帳房主任的 2 名證人證言內容可得悉，按照借款單上的資料，真正借款人是 H 而並非上訴人；上訴人只是充當 “H 伙記” 之角色，即上訴人作為 H 之員工，按 H 之指示為其領取籌碼。

29. 同時，尤其根據證人 I 之證言可得悉，其本人有份在本案借款單上簽名見證，其清楚交代了當時 XX 集團是透過電話方式得到 H 本人同意後，才發出相關由其伙記(即上訴人)代為取籌碼之確認文件，才將籌碼交給上訴人。

30. 儘管證人 I 未能區分擔保與授權在法律上的定義，但從其證詞可得出，借款人是 H，因此 H 絕不可能是擔保人，更何談借款人是上訴人？

31. 再者，根據卷宗被異議人(被上訴人)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提交之反駁狀第十七至二十一點。

32. 以及根據證人證言獲悉，作為 XX 集團負責出籌碼的部門(帳房)，亦表示是經戶主 H 明示同意下，才向上訴人作出交付籌碼的行為，由此可見，被上訴人及

XX 集團的員工均清楚知悉 H 與上訴人之間僅存在僱傭關係。

33. 由此可見，不論是由被上訴人在反駁中的陳述、還是由其提供之證人證言均指出，帳戶持有人(戶主)H 是透過明確授權方式(有錄音記錄)，指示上訴人由其帳戶內出碼予其伙記 A。

34. 再者，根據被上訴人於卷宗第 162 頁提交的 XX 集團上訴人 A 的開戶卡資料咭獲悉，該咭上的賬號填寫處明顯可見是由數字 506 塗改及掩蓋後變成了數字 256，而開戶日期卻沒有作出任何更改，因此，針對該開戶卡資料咭的真偽無疑是存在著一個疑點。

35. 而事實上，上訴人已於 2021 年 6 月 2 日按民事訴訟法典第 431 條規定提出證據措施時已請求法庭令“D 貴賓會”出示書面文件證明上訴人是否曾在 D 貴賓廳以其本人“A”名義開設博彩戶口(編號為 256)及該賬戶一直以來之流水賬記錄，以查明真相，然而卻沒有得到回覆。

36. 另外，於同日針對被異議人提交的卷宗第 141 至 162 頁文件發表意見時，亦再次請求法庭命令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去函葡京 XX 集團提供載博彩賬戶(506 及 256)資料及流水賬資料等。但同樣得不到回應。

37. 被上訴人之證人 J 以其入職 XX 集團多年的經驗，可以得悉，XX 集團作為一間營運多年的大規模公司，一定會將所有文件，包括流水帳、電腦記錄、帳戶資料、借款錄音對話記錄等保存妥當，以便日後核對還款之用，更指出絕不會出現文件遺失的情況。

38. 但，為何在整個訴訟過程中，XX 集團卻從未向法庭提供過相關帳戶資料、帳戶流水帳、錄音記錄等等對證明借貸存在的文件呢？

39. 再者，綜合上述由被上訴人在反駁中的陳述、其提供的證人證言以及疑點，可以合理推斷及證實編號為 256 號博彩賬戶真實持有人為 H，並非上訴人 A，而 A 只是作為“伙記”身份在獲得 H 的口頭授權後，為其提取籌碼；故，針對博彩賬戶編號為 256 號所生的債務不應由作為“伙記”僱員的上訴人負責承擔，而是由其僱主/帳戶持有人 H 承擔償還。

40. 眾所周知，於各個賭場貴賓廳借貸，必須先開設帳戶，繼而根據客戶帳戶內的信用額度批出借貸；信用額度會根據不同客戶的還款情況、經濟狀況等訂定，因此，根據一般經驗，絕對無可能出現以自己名義於他人帳戶借貸或沒有開立帳戶直接借貸的情況。

41. 根據被上訴人(被異議人)在反駁中的陳述、其提供的證人證言獲悉，債權人即 XX 集團是絕對清楚知悉真正的借款人並不是上訴人，因為每筆 Marker 借貸不單要根據賬戶信用額度借出，還必須要有賬戶方可簽 Marker，而且賬戶之信用額度是 XX 集團按照不同賬戶持有人而存有不同審批手續的；由此得出，XX 集團借貸對象是 H。

42. 綜觀整個判決內容、案卷內所有書證和人證均可證實《借款單》借款人簽署欄上有兩個簽名，但到底何人才是真正的借款人呢？判決內似乎沒有具體指出。為此，根本無法毫無疑問得出單純按其中一個疑似上訴人筆跡的簽名，便一口咬定借款人便是上訴人，這是不可能接受的。

43. 為此，調查基礎內容第 8 點的事實不應視為證實，因為博彩賬戶編號 256 的真正持有人並非上訴人 A。

44. 同時，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根據上述疑點和明顯矛盾，調查基礎內容第 8 點的事實理應不獲證實，因法院所持依據與裁判之間出現邏輯矛盾的情況，故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條 c 項之規定，判決應為無效。

II. 原審判決中針對惡意訴訟之判決

45. 原審法庭依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385 條第 2 款 a) 項認定，上訴人為惡意訴訟，分為兩部分: a) 異議人否認在執行名義上簽署過，顯然是異議人於卷宗裡說謊；b) 異議人反對被異議人所要求的鑑定措施，該不當行為在程序上造成了時間和資源的浪費。

46. 被上訴人於 2019 年 7 月 19 日向上訴人提起“以私文書作為執行名義之支付一定金額之執行之訴通常訴訟程序”，根據作為執行名義的借款單的簽發日期分別為 2006 年 1 月 2 日、2006 年 1 月 3 日及 2006 年 1 月 9 日，兩者相距差不多 13

年之久。上訴人無法憶起事實之全部亦屬情理之內，且上訴人對借款單上是否自己的簽名方式亦感到很可疑，因為這與其多年來的身份證簽名是不同的。

47. 再者，被上訴人(請求執行人)短期內向其提起多個執行案，而且每個案件的請求執行金額都非常巨大；在相距 13 年多時間，在多次要求被上訴人(請求執行人)提供諸如賭廳帳房借貸流水帳、帳戶取碼記錄數據、追數或授權電話錄音記錄等等資料時均不果；上訴人作為一名普通市民，非常疑惑案中的借款單上簽名是否自己，又或是自己有否簽署該文件，是否已償還款項，都是十分正常的；因而就執行之訴提出異議。

48. 事實上，上訴人並非審判時才提出借款單的簽名有可疑、懷疑非由上訴人簽署的，以及資料咭上存有塗改痕跡因而產生很大疑問，上訴人在提出異議時於首份訴辯書狀及訴訟期間都不斷提出質疑。

49. 更值得深究的是，根據被上訴人證人於庭審上向法庭作出的證言可知悉，被上訴人的員工及上訴人，均知悉戶主 H 才是老闆，上訴人只是聽從老闆的指示工作；因此，在間距 13 年後記不起自己曾否簽署過案中借款單或老闆有否還款等情況絕對是有可能的；再者，借款單上的簽名與 13 年後上訴人的簽名亦有相當大的出入，故上訴人對此產生懷疑亦是正常的，根本不能視其持有主觀上過錯。

50. 上訴人作為訴訟對立方，在不知悉事實是否正確無誤時，理應行使法律賦予之基本抗辯之權利，針對存有疑問的地方提出反對。

51.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35 條之規定，上訴人身為澳門居民有權訴諸法律，向法院提起訴訟，得到律師的幫助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以及獲得司法補救。

52. 上訴人行使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對自己不清楚的事實或懷疑的事實，有權提出異議或反對，以捍衛基本法賦予的訴訟權利，盡管最終被否定該事實，但這正正是訴訟存在的意義。

53. 再者，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8 條及第 9 條之規定，上訴人一直積極配合訴訟程序的進行，於訴訟期間根據情況向原審法院作出解釋及發表意見，亦沒有出現任何可歸責於上訴人的延誤。

54. 關於 “b) 異議人反對被異議人所要求的鑑定措施，該不當行為在程序上造成了時間和資源的浪費” 部分

55. 根據卷宗資料，於 2021 年 6 月 2 日上訴人已針對被上訴人提出進行筆跡鑑定措施發表意見，當中已就被上訴判決裁定惡意訴訟部分發表了其本人之意見。

56. 正如上述，上訴人作為訴訟對立方，有權提出其觀點。且最後上訴人亦尊重法庭的決定。再者，上訴人的意見是認為其已連同起訴狀一併提交了由澳門身份證明局發出之上訴人歷年來於澳門身份證中的簽名樣式之證明書，可顯示出上訴人的簽名方式與《借款單》上簽名人一欄中的簽名存在很大出入，是平常人肉眼能辨的分別，故而認為沒有進行筆跡鑑定的必要。

57.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4 條之當事人平等原則之規定，在整個訴訟過程中，雙方當時人均具有實質平等的地位，即代表被上訴人可提出請求，同時，上訴人有權利針對該請求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由於地位平等，因此並不是能單方面跟隨被上訴人的意見。

58. 綜上所述，上訴人並沒有作出任何違法行為，且沒有對整個訴訟程序造成任何負面影響，相反，上訴人積極發表意見，配合整個訴訟的進行，堅持遵守《民事訴訟法典》第 8、9、10 條規定之合作原則、善意原則及相互間行為恰當之義務，足以顯示上訴人從沒有在訴訟程序的任何階段企圖損害對訴訟程序、法院及公正本身。

59. 再者，從曾在 XX 集團工作多年的證人 I 的證言中可以得悉，XX 集團一直以來都有將歷年的流水帳、簽借款單記錄、授權書等電腦或手寫記錄保存妥當，是絕對不可能丟失的，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沒有履行合作義務。

60. 相反，上訴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一直以積極態度與法院合作，善意地提供所有對正確判斷案件屬必需的資料，為尋求事實真相一直都要求被上訴人提供對案件有關的資料，當中包括 XX 集團的流水紀錄等對案件審理屬重要及關鍵的證據，無奈 XX 集團卻無法提供(但案中各證人卻一直強調公司是存有該等證據文件的)。

61. 綜上所述，獲證明之事實根本不滿足《民事訴訟法典》第 385 條惡意訴訟的要件。

62.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錯誤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 385 條，謹請 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撤銷被上訴判決判定惡意訴訟部分。

63. 根據中級法院第 89/2016 號合議庭裁判中指出：「原則上，法院審理待證事實是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經驗法則和常理在評價依法可受理的證據方法後形成正內心確信以對事實問題作裁決 – 見《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五十八條。」

64. 根據卷宗一切資料及一般經驗法則，尤其《借款單》上所謂的上訴人之簽名，根本缺乏任何客觀的證據證明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

65. 因此，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時明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民事訴訟法典》第 558 條證據自由原則，有關調查基礎內容第 6、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點的事實應視為不獲證實。

66.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629 條之規定，中級法院得變更初級法院就事實事宜所作之裁判。

綜上所述和依賴法官 閣下之高見，請求裁本上訴理由成立。”

*

請求執行人在答覆中點出以下結論：

“一、關於上訴陳述第 I. a) 部份，上訴人針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6 項之回覆提出爭執，認為上述事實中所提及的合同在形式要件方面違反了第 5/2004 號法律第 8 條第 1 款之規定，因而根據《民法典》第 212 條之規定合同屬於無效，故作為博彩中介人的被上訴人在未具備合法信貸業務合同下作出的放貸行為不受第 5/2004 號法律所保障，即本案債務即使存在亦僅屬自然債務，不得透過司法途徑追討。

二、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599 條第 1 及 2 款之規定，如上訴人要推翻原審法院在事實事宜方面之裁定，只能依據卷宗本身所載的證據，又或是透過庭審過程(例如詢問證人)而得出的證據來支持其就事實方面之裁判所提出之爭執。

三、首先，上訴陳述第 6 條所指出的卷宗第 143 至 147 頁的《臨時信貸合同》上根本無指出有關簽署並非當場認定。

四、正如原審判決所作之分析，對於上述合同的有效性，上訴人從未以異議理由的方式提出，並以此作為依據來反對執行。

五、上訴陳述第 9 條所指由上訴人提交的書狀，只是屬於對被上訴人所提交文件的回覆，而並不是在異議程序中的專門訴辯書狀。

六、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696 條第 1 至 3 款之規定，以及對該等條文之解釋，法律上是規定了異議人必須透過異議來反對執行，即使出現嗣後知悉之事宜，亦須於 20 日內透過嗣後的專門訴辯書狀提出，方可構成異議程序本身的審理範圍。

七、即使考慮合同的無效是可依職權審理，但基於《民事訴訟法典》第 696 條之限制，亦不可能任由異議人在任何階段中提出有關問題而法院亦必須作出審理，因為在已脫離異議程序本身的常理範圍下，法院根本沒有足夠的已證或待經事實來支持對有關法律問題給出討論。

八、而上訴陳述第 16 條所附上的另一案件判決書亦只是上訴人於上訴陳述階段才向本案提交的文件，原審法院根本無可能在其審理案件的過程中考慮到該文件，所以上訴人在現階段才提交該文件來試圖向上級法院請求推翻原審法院所作出的事實認定，明顯是無實際作用的，而且尤其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典》第 599 條第 1 款 b 項之規定，因為該文件根本不是本身已載於卷宗的文件。

九、據被上訴人所了解，該案之初級法院判決內容亦不是終局確定性判決，有關案件仍處於上訴階段，因此對本案更無任何參考價值，更勿論足以如上訴人所主張的以該文件內容來推翻本案已證事實的結論。

十、此外，還必須指出的是，實情並不是如上訴陳述第 17 條中所陳述。

十一、該案的審理主席法官 閣下認為有關公證員的回覆是傾向表明該次認證是屬於一次當場認證的，只是法官 閣下基於其他理由才作出認為有關公證認定非屬當場認定之結論。

十二、事實上，根據上訴人自己於上訴陳述第 18 條中所援引的公證員回

覆，被上訴人所理解到的意思也與上訴人所指出的截然不同、

十三、上述公證員的回覆意思是：從認定的內容看來，雖然沒有插入“在我面前作出”的表述，但其內容使我們得出結論認為是一次當面認定。所以，被上訴人也難以理解上訴人為何在上訴陳述第 18 條中認為該份《臨時信貸合同》並不是親身在公證員面前簽署的之論點。

十四、總結而言，被上訴人認為不論是透過載於本案卷宗本身的證據，又或是透過上訴人在上訴陳述階段方提交的文件，亦不足以支持其推翻調查基礎事實第 6 項之回覆之主張，因此應駁回此項上訴理由。

十五、即使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述事實事宜爭執之觀點並不成立，但為著謹慎進行訴訟之目的，被上訴人還試從法律層面上就有關合同形式要件方面的問題作出如下的反駁：

十六、第一方面，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對有關文件的簽署非屬當場認定之爭辯屬於消極性事實，並根據《民法典》第 335 條第 2 款之規定，應由主張債權所針對之人，即本案的上訴人負責舉證及證明之。

十七、被上訴人綜觀整個卷宗內由上訴人所提交之訴辯書狀及文件，當中上訴人並無對其所提出的爭辯進行任何舉證，亦無提供任何人證及書證以證明有關合同上之簽名“非屬當場認定”。

十八、相反，正如被上訴人上述所指出及援引制作有關簽名認定的公證員閣下透過其向另案所作出的書面回覆亦指出該次認定是屬於一次當面認定。

十九、據此，在本案中至少應認為當時博彩承批公司的法人代表的簽署是一項當場認定，又或應可視為等同於“當場認定”之效力，又或至少是高於“對照認定”之效力。

二十、因此，從法律適用的角度分析也應認為被上訴人是在具備合法的信貸業務合同下作出本案的放貸行為，並應受第 5/2004 號法律制度所保障。

二十一、第二方面，即使不認同上述，按照有關公證認定的行文，相關公

證員已按照《公證法典》第 162 條第 2 款最後部份之規定註明該認定係因其本人知悉而作出，且證實有關人士具足夠權力代表公司作出行為，這足以代表有關公證員已確保該公證行為之有效性。

二十二、此外，該卷宗文件右上方之公證認定收費費用是澳門幣 28 元，以兩個簽名來計算，考慮到私人公證員之收費是公共公證員之三分之二，可推算出當時公證員對有關兩個名簽名之認定是收費每個 20 元，即可印證該次簽名認定是屬於一次“作出特別證明之認定”。(見第 522/99/M 號訓令之附件《公證手續費表》第 13 條第 2 款之規定)

二十三、的確，根據第 5/2004 號法律第 3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以及第 8 條第 1 款之規定，有關博彩承批公司與博彩中介人之間簽署的合同的簽名須經當場公證認定。

二十四、上述法律的立法目的顯然只是希望保障有關合同的嚴謹性，從而排除使用“對照認定”來完成有關合同。

二十五、《民法典》第 369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之規定區分了“當場認定”與“對照認定”之間的在法律效力上的分別，但並沒有指明或區分“作出特別證明之認定”在法律效力上是屬於上述兩者之一還是有其獨立的第三種法律效力。

二十六、但從一般經驗作出分析，“作出特別註明之認定”是由公證員親自指出及註明有關認定係因其本人知悉而作出，且證實有關人士具足夠權力代表作出行為，這種認定方式應可視為等同於“當場認定”之效力，又或至少是高於“對照認定”之效力。

二十七、綜合上述，被上訴人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在法律適用的層面上，裁定卷宗第 147 頁上的公證簽名認定之效力已高於或至少等同於當場認定之效力，因此並沒有違反第 5/2004 號法律第 8 條第 1 款之規定，且不會導致出現導致涉案債務不產生法定債務之問題。

二十八、關於上訴陳述第 1.b) 部份，上訴人認為涉案執行名義上載有兩個

簽名，而涉案債務的真正債務人是 H，並不是上訴人，以及結合上訴人的開戶資料，基於有疑點，所以認為調查基礎事實第 8 項應不獲得證實。

二十九、除對不同見解給予尊重外，被上訴人認為依據本案的其他獲證事實，尤其是已確定事實 A)項及對調查基礎事實第 9 項至 20 項之回覆，也根本得不到涉案借貸的真正借款人並不是上訴人，而是另有其人的結論。

三十、從證據層面來分析，正如由上訴人所援引的證人 K、I 及 J 的證言內容，也可以明顯地得出結論認為，涉案借貸是透過 H 的擔保、繼而由上訴人 A 向被上訴人借出的，即 H 只是本案債務的擔保人，而借款人則為上訴人 A 本人。

三十一、原審法院也是基於有此認定，所以才於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8 項作出回覆時特別註明 “Provado, com o esclarecimento que não se provou que o exequente concedesse crédito ao executado sem que fosse dada garantia por terceiros.”

三十二、更重要的是，本案中已透過筆跡鑑定措施證實，涉案執行名義上“借款人”一欄的簽名是由上訴人所簽，被上訴人已持有充分證明力的文件作為書證，證明涉案借貸是由上訴人親自借出。

三十三、對此，我們還必須考慮的是，涉案債務是於 2005 年作出，當時賭權才剛剛開放，貴賓廳行業內的業務均是處於起步階段，而所謂的貴賓廳博彩帳戶制度亦顯然不是如近年般成熟地運作。

三十四、尤見涉案執行名義上所載，當中並無如近年的貴賓廳借款單般記載有博彩帳戶的持有人名稱和編號，即當年的博彩借貸根本只會以簽署借款單為準，並以借款單本身來作為債權人一方所持有的憑證。

三十五、我們必須考慮案發時的娛樂場行業背景，當時作出博彩信貸根本沒有要求借款人必須持有博彩帳戶，當時一般人開立博彩帳戶的目的基本上只是為了方便存取款項，而與作出博彩信貸行為無關。

三十六、即使上訴人自己開立戶口也好，透過他人開立戶口也好，也不能

據此來推翻其親身簽署涉案的借款單來借取博彩信貸之事實。

三十七、綜合上述，上訴人所提出的此部分理由明顯不足以推翻原審法院透過鑑定證據、書證和證人證言來作出認定的各項已證事實，故應予以駁回。

三十八、關於原審判決中針對惡意訴訟之判決之部分，由於被上訴人沒有提出惡意訴訟的賠償請求，原審法院亦僅因上訴人否認其自己的簽名並對本案撒謊而對其作惡意訴訟的處罰，因此被上訴人認為其對此部分的判處並無直接的利害關係，亦無對此部分上訴理由和範圍作出答覆的利益，為此，請求尊敬的上級法院對此問題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裁決。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 閣下駁回上訴人所提出的全部上訴理由，並完全維持原審法院所作出之裁判。”

*

助審法官已對卷宗作出檢閱。

二、理由說明

經過庭審後，原審法官認定以下事實：

Por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76/2002, de 27 de Março de 2002, foi concedida à C uma licença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O exequente, também conhecido por L, na década de 90, antes da liberalização do jogo, já era proprietário da “sala D” na Sala VIP do Casino Lisboa, da “M”. (Q. 1º)

O exequente criou, na década de 90 do século passado, o “Grupo D de Macau”, que explorava, em nome próprio, os negócios das salas VIP do casino em consórcio com a “M”, e abriu e explora várias salas de jogo no Casino Lisboa. (Q.

2°)

Antes da entrada em vigor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6/2002 (que regula as condições de acesso e de exercício da actividade de promo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o exequente já trabalhava como promotor de jogo. (Q. 3°)

O "Grupo D de Macau" do exequente também transitou com a M para a C, tendo exercido a actividade de promotor de jogo nos casinos da M e da C, sem interrupções. (Q. 4°)

O exequente concedia crédito para jogo aos jogadores no exercício da actividade de promotor de jogo. (Q. 5°)

Em 17 de Maio de 2005, a C celebrou com o exequente um "Contrato Provisório de Concessão de Crédito" através do qual, o exequente estava autorizado a conceder crédito para jogo ou para aposta na sua sala VIP "D", com um prazo de validade até à obtenção da licença e registo de promotor de jogo do exequente, devidamente autorizados pelas autoridades competentes. (Q. 6°)

Em Setembro de 2008, o exequente solicitou, pela primeira vez, a licença de promotor de jogo de pessoa singular à Direcção de Inspeção e Coordenação de Jogos de Macau e, no mesmo ano, obteve a primeira Licença de promotor de jogo n.º I104, que foi renovada até à presente data. (Q. 7°)

O executado é um jogador que explora e detém na sala

VIP do exequente uma conta de jogo n.º 256, através da qual pode contrair empréstimos em fichas mortas exclusivas para jogo. (Q. 8º)

Em 2 de Janeiro de 2006, o executado pediu ao exequente que emprestasse fichas mortas exclusivas de jogo no valor de HKD1.000.000,00, para serem usadas nos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Q. 9º)

No mesmo dia, o funcionário da Sala VIP "D" entregou ao executado fichas mortas exclusivas de jogo no valor de HKD1.000.000,00, e o executado recebeu as referidas fichas. (Q. 10º)

O executado comprometeu-se a restituir a dívida o mais breve possível, isto é, o exequente tinha o direito de exigir ao executado o reembolso a qualquer momento. (Q. 11º)

O executado assinou na coluna "mutuário" do "talão de empréstimo", constante de fls. 31 dos autos principais. (Q. 12º)

Em 3 de Janeiro de 2006, o executado pediu ao exequente que emprestasse fichas mortas exclusivas de jogo no valor equivalente a HKD\$2.000.000,00, para serem usadas nos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Q. 13º)

No mesmo dia, o funcionário da Sala VIP "D" entregou ao executado fichas mortas exclusivas de jogo no valor de HKD2.000.000,00, e o executado recebeu as referidas fichas. (Q. 14º)

O executado comprometeu-se a restituir a dívida o mais breve possível, isto é, o exequente tinha o direito de exigir ao executado o reembolso a qualquer momento. (Q. 15°)

O executado assinou na coluna "mutuário" do "talão de empréstimo", constante de fls. 32 dos autos principais. (Q. 16°)

Em 9 de Janeiro de 2006, o executado pediu ao exequente que emprestasse fichas mortas exclusivas de jogo no valor equivalente a HKD\$4.000.000,00, para serem usadas nos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Q. 17°)

No mesmo dia, o funcionário da Sala VIP "D" entregou ao executado fichas mortas exclusivas de jogo no valor de HKD4.000.000,00, e o executado recebeu as referidas fichas. (Q. 18°)

O executado comprometeu-se a restituir a dívida o mais breve possível, isto é, o exequente tinha o direito de exigir ao executado o reembolso a qualquer momento. (Q. 19°)

O executado assinou na coluna "mutuário" do "talão de empréstimo", constante de fls. 33 dos autos principais. (Q. 20°)

Nos trê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a assinatura em língua estrangeira acima da assinatura em chinês do embargante/executado Afoi feita por H. (Q. 21°)

N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anexos 14, 15 e 16 do pedido de execução, o campo de assinatura do mutuário contém duas

assinaturas. (Q. 24°)

*

被執行人對調查基礎內容的第 6 條事實提出爭執，認為原審法官對該事實的認定存在錯誤。

原審法官對該爭議事實給出了以下回答：

第 6 條 - “於 2005 年 5 月 17 日，C 與請求執行人簽訂了一份《臨時信貸合同》，透過該合同，請求執行人獲許可在其所開設的 “D” 貴賓會內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之業務，而有效期直至請求執行人的中介人牌照及登記獲得當局批准為止？” ，原審法官認定為 “獲證實” 。

關於事實事宜裁判的可變更性問題，根據補充適用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629 條第 1 款的規定：

“遇有下列情況，中級法院得變更初級法院就事實事宜所作之裁判：

a) 就事實事宜各項內容之裁判所依據之所有證據資料均載於有關卷宗，又或已將所作之陳述或證言錄製成視聽資料時，依據第五百九十九條之規定對根據該等資料所作之裁判提出爭執；

b) 根據卷宗所提供之資料係會導致作出另一裁判，且該裁判不會因其他證據而被推翻；

c) 上訴人提交嗣後之新文件，且單憑該文件足以推翻作為裁判基礎之證據。”

按照上述規定，中級法院可以在下列情況下變更原審法院對事實所作的裁判：

- 當所有證據資料均已載入卷宗內，或者已將相關陳述或證言錄製成視聽資料時，對根據該等資料所作之裁判提出爭執；

- 卷宗內所提供的資料必然導致作出不同的裁判；

- 嗣後之新文件足以推翻作為裁判基礎的證據。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599 條的規定，“如上訴人就事實方面之裁判提出爭執，則須列明下列內容，否則上訴予以駁回：

a) 事實事宜中就何具體部分其認為所作之裁判不正確；

b) 根據載於卷宗內或載於卷宗之紀錄中之何具體證據，係會對上述事實事宜之具體部分作出與上訴所針對之裁判不同之另一裁判。”

眾所周知，法官在評定證據時享有自由心證 (參見《民事訴訟法典》第 558 的規定)。

關於心證方面，中級法院第 322/2010 號上訴卷宗中提出了以下精闢觀點：

“除涉及法律規定具有法院必須採信約束力的證據外，法官應根據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證據的證明力以認定或否定待證事實。

此外，澳門現行的民事訴訟制度設定上訴機制的目的是讓有利害關係的當事人，以一審法院犯有程序上或實體上、事實或法律審判方面的錯誤為依據，請求上級法院介入以糾正一審法院因有錯誤而致不公的判決，藉此還當事人的一個公道。

申言之，如非一審法院犯錯，上訴法院欠缺正當性介入和取代一審法院改判。”

另外，中級法院在第 162/2013 號上訴卷宗中也指出，“法官對證據的評定享有自由心證，上級法院只有在明顯的錯誤下才可推翻”。

由此可見，只有當一審法院在審查證據以認定事實時存在錯誤，上訴法院方能廢止第一審法院所作的事實裁判，並自行重新評價相同的證據以改判事實。

而在評價證據時可能出現的錯誤包括違反關於法定證據的規定，或明顯違反經驗法則和常理。

在本案中，原審法官主要依據卷宗的書證和證人的證言來對爭議事實作出判斷。然而，該等證據並不屬於具有約束力的法定證據，對於認定受爭議的事實並不具有完全證明力。

既然這些證據方法不具有約束法官必須採信的效力，那麼法官便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558 條規定，對證據進行自由評價，包括自由評價文件內容及證人證言的可信性。由此可見，原審法官對證據所作的評價並未違反關於法定證據的規定。

接下來，讓我們審查原審法官在審理事實時是否違反了經驗法則和常理。

原審法官在對調查基礎內容的第 6 條事實進行回答時，給出了以下評價：

“Acresce que se questiona se o exequente reunia condições para exercer a actividade de promoção de jogo e de concessão de crédito para jogo e se o fazia explorando o “D”. A primeira razão por que o tribunal considerou provada tal factualidade foi porque era ao executado/embarcante que cabia alegar e provar que o exequente não reunia tais condições. Na verdade, cabia-lhe alegar e provar, como fundamento de embargos, os factos impeditivos do crédito exequendo, designadamente eventuais nulidades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e crédito para jogo por falta de requisitos legais. O embargante limitou-se a dizer que não sabe nem tem obrigação de saber (art. 38º do requerimento inicial dos embargos de executado). Mas não é assim. O embargante tem o dever/ónus processual de alegar os factos que fundam a sua oposição à execução (arts. 695º a 699º e 389º, n.º 1, al. c) do CPC). Seja como for, os referidos documentos e os depoimentos prestados em audiência pelas testemunhas antes referidas são suficientes para convencer o tribunal que o exequente celebrou com a C um contrato com vista à concessão de crédito e que, depois, o exequente obteve licença e registo de promotor de

jogo. Acresce que de fls. 147 destes autos não resulta que não tenham sido presencialmente reconhecidas as assinaturas do exequente e dos representantes da “C” no acordo celebrado para concessão de crédito pelo exequente, contrariamente ao que o embargante defende.”

被執行人表示，案中的臨時信貸合同上的簽名未經當場公證認定，認為在未具備合法信貸業務合同的情況下進行的放貸行為不受第 5/2004 號法律的保障，涉案的債務僅屬自然之債，因此不能通過司法途徑進行追討。上訴人進一步指出，原審法官應依職權查明案中受爭議的事實，尤其是被上訴人是否在未具備合法信貸業務合同的情況下進行了放貸行為。

本院認為，異議聲請書相當於普通訴訟程序內的答辯狀。作為異議人，上訴人應在異議聲請書中提出所有異議的理由，否則便違反了提出異議的時限原則和集中防禦原則。

事實上，對於相關臨時貸款合同是否因簽名未經當場認定而視為無效，屬於一項永久抗辯，上訴人負有陳述及證明該抗辯所依據的事實的責任，並且須在提出異議時主張有關抗辯(見《民事訴訟法典》第 696 及 697 條)。

倘若上訴人在提出異議後才得悉有關情況，也必須通過嗣後書狀來提出相關抗辯事實。

在本案中，上訴人作為異議人，既沒有在異議聲請書中提出，也沒有通過嗣後書狀主張有關抗辯事實，而僅限於對被異議人所提交的書證作出回應。因此，原審法官沒有對案中的臨時貸款合同是否無效的問題進行審理，這一做法是正確的。

基於此，原審法官根據書證、人證及鑑定證據對調查基礎內容的

第 6 條事實作出認定，並無任何受質疑之處。所以本院合議庭裁定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

另外，上訴人也對調查基礎內容的第 8 條事實提出爭執，認為原審法官對該事實的認定存在錯誤。

原審法官對該事實給出了以下回答：

第 8 條 - “被執行人是一名博彩者，在請求執行人的貴賓廳開設及持有博彩賬戶，編號為 256，可以透過該賬戶借貸博彩專用泥碼進行博彩？” ，原審法官認定為 “獲證實” 。

原審法官同時給出了以下評價：

“Relativamente à solicitação dos empréstimos e à entrega das fichas emprestadas foi também determinante para 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o depoimento das referidas testemunhas, avaliado nos termos sobreditos, sendo que conheciam o embargante como cliente do “Grupo D” onde trabalhavam e como tendo solicitado crédito ao exequente, embora no âmbito de uma relação não concretamente apurada com o seu irmão H, o qual também assinou os títulos executivos de fls. 31 a 33 dos autos de execução. Foi também determinante 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I, a qual prestou depoimento claro, firme, sereno e fundamentado e revelou directa razão de ciência por ter participado na emissão dos títulos executivos de fls. 32 e 33, nos quais consta a sua assinatura. Os depoimentos das referidas testemunhas foram precisos quanto a ter sido o embargante a solicitar e a receber o empréstimo, mas já não foram precisos quanto à concreta relação entre os irmãos A e H, nem no sentido de o segundo ser garante do primeiro, nem no sentido de o primeiro ser representante do segundo. Por isso foi também relevante o teor literal dos próprios títulos executivos, assinados pelo embargante, um deles traduzido a fls. 334 destes autos de embargos referindo que “...

A(H) conseguiu obter o empréstimo...” e que “... o seu reembolso poderá ser feito a qualquer momento”, teor literal que aponta claramente no sentido de o exequente ser aquele que solicitou e recebeu e H ser convededor, embora a título não concretamente apurado.

Quanto à intervenção de H nos títulos executivos (quesitos 21º a 24º), além do teor impreciso e opinativo das testemunhas antes referidas, e de não haver divergência entre as partes quanto à assinatura de H nos títulos executivos, nenhuma outra prova foi produzida que com segurança permitisse ao tribunal adquirir certeza que a referida assinatura tivesse sido aposta posteriormente à do embargante e que significasse uma garantia relativamente à obrigação do embargante. Assim, quanto aos factos não provados foi na insuficiência da prova produzida que se formou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sendo ainda de referir que as testemunhas N e O demonstraram apenas conhecimento generalista da forma como o exequente explorava a sua actividade comercial.”

上訴人表示，根據卷宗內的書證和證人的證言，他僅以員工身份在獲得 H 的口頭授權後為其提取籌碼，實際的債務人應是 H 而非上訴人本人。

如上所述，法官可自由評價證言的價值，且不受制於個別證人的證言。事實上，法官會綜合考慮所有證據，對事實形成內心的確信。

在本案中，原審法官根據書證、人證和鑑定證據對爭議事實進行了分析及審理。

書證及鑑定結果足以顯示相關執行名義是由被執行人所簽署的。

而人證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上訴人簽署了本案的執行名義，並收取了執行名義上所顯示同等數額的泥碼。至於另一位同樣在執行名義上簽名的人士，即上訴人的哥哥 H，則無法清楚查明二人在相關交易

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缺乏更為充分證據的支持下，本院認為原審法官對調查基礎內容的第 8 條事實所給出的回答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其中並未發現不妥之處，因此裁定該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

最後，上訴人不認同將其裁定為惡意訴訟人。

關於此問題，原審法官作出了如下裁判：

“Quanto à qualidade da litigância do embargante.

O executado negou nos autos ter assinado o título executivo e provou-se que o assinou. Mentiu nos autos. Não devia mentir nos autos (art. 9º do CPC). Deduziu oposição cuja falta de fundamento não devia ignorar. Litigou claramente de má-fé (art. 385º, nº 2, al. a) do CPC).

O exequente embargado não pediu a condenação do litigante de má-fé em indemnização. Resta a sanção da multa (art. 385º, nº 1 do CPC), a qual deve ser fixada entre 2 e 100 UCs. (art. 101º do RCT).

A indevida actuação processual do embargante gerou dispêndio de tempo e de recursos, designadamente na realização de prova pericial cujo relatório se mostra a fls. 170 a 179. É uma actuação dolosa. Por tudo o referido fixa-se a multa em 15 (quinze) UCs.”

事實上，如果上訴人因時間間隔過長而無法完全回憶起相關事實，可以表示已忘記具體情況，而不應在異議聲請書中堅決地聲稱“從未簽署過載於請求執行之最初聲請狀附件 14 至 16 的三張借款單”。

僅根據這一點，就足以斷定異議人即上訴人故意歪曲了關鍵事實，因此必須將其裁定為惡意訴訟人。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 A 提起的司法裁判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本審級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

登錄及作出通知。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 年 6 月 27 日

唐曉峰

(裁判書製作人)

李宏信

(第一助審法官)

馮文莊

(第二助審法官)